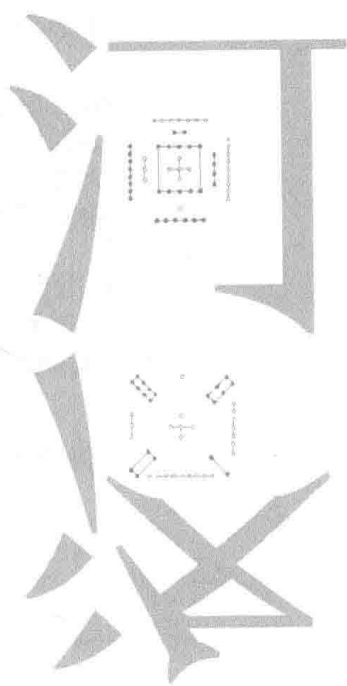


河洛文化研究丛书

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

安国楼等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河洛文化研究丛书

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

安国楼 张得水 张留见 王丽杰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 / 安国楼等著. —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8. 2

(河洛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215 - 10212 - 5

I. ①河… II. ①安… III. ①文化史—河南—文集 ②客家人—民族文化—中国—文集
IV. ①K296.1 - 53 ②K281.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7224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6578806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7

字数 240 千字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18.00 元

绪 论

以“河图洛书”传说为早期肇始重要标志的河洛文化,是产生于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区域文化。而具有移民特征的客家文化,是具有浓郁中原文化底蕴并恒久保持至今的一种族群文化。这两种文化,从核心内涵上去认识,前者有其远古性,后者有其近一千年的后时代性,但二者都具有鲜明的特色或个性,对中国乃至世界人类文明的进步都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同时,这两种文化又与中原、河洛区域文明的发展直接相关,并具有深层的渊源联系。

“河洛”,指黄河、洛水。河洛地区,指以黄河、洛水夹角地带为中心区域的地区,也就是狭义的中原中心区。历史上的“河洛”,既是地域概念,更是文化概念,具有丰富深邃的人文内涵。司马迁《史记》中说:“昔三代之君(居),皆在河洛之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司马光《过故洛阳城》诗中写道:“烟愁雨啸奈华生,宫阙簪萁旧帝京。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这里所强调的,就是在中国早期文明发展进程中,河洛地区所具有的中心地位和作用。因此说,河洛文化,就是指历史上孕育、形成、发展于河洛中心区域的文化,也就是狭义的中原文化。河洛地区位于中原之腹地,是中华先民最早的繁衍生息之地,从这里产生、发展而形成的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的源头、核心和主流,对中华文明摇篮中原大区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发端、统帅和辐射意义。可见,河洛文化不是一般的地域文化,而是中华民族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总括而言,河洛文化起源于史前,形成于夏商周,发展于秦汉魏晋南北朝,鼎

盛于隋唐宋。那么,从河洛文化的源头和主流地位去认识,至少到北宋灭亡之前,以河洛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经历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阶段。在各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既有传承,又有扬弃,但毋庸置疑的是,各阶段的文化发展水平都处在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

“河图洛书”的传说,凝结着古代先哲神秘的想象和超凡智慧,并成为后世漫长历史时期哲学、儒学、医学、天文等思想理论学说的重要源泉,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社会进步,具有永恒的魅力和影响作用。传说的人文始祖黄帝、炎帝在这个地区活动。黄帝的后裔颛顼、帝喾以及尧、舜等作为部族首领在这一地区形成了许多邦国,孕育、衍生出众多的姓氏家族,包括了后代主要中华姓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的繁殖,农牧业、手工业经济的高度发展,又使得河洛地区率先跨入奴隶制时代,产生了夏王朝。登封告成是夏都所在地。夏朝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之后的商、周都曾在这里建都。成熟的文字、城市、礼制、历法和青铜铸造技术等,首先在这里产生和发展,标志着中华文明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的很多篇章即产生于河洛地区。周代确立以礼乐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规范,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地下考古发掘资料显示,由早期的裴李岗文化到仰韶文化,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以及夏、商、周各代遗存,可谓星罗棋布。从众多考古发现与典籍记载的相互印证中,人们可清晰看出早期中华文明在河洛地区的发展脉络及其影响走向。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考察的古遗址,基本全在河南境内,并处于河洛核心区域。

秦统一后,尽管各区域文化的差异有所减弱,但中原地区的文化是延续不断、前后相接的,而且表现出更加强化、扩大和丰富的特征。儒学独尊后的汉代、政权更迭的魏晋南北朝之世、繁荣发展的唐宋时期等,无论文学、史学、宗教、科技、艺术等领域,加之后世地上地下的众多遗迹遗存,都无不彰显河洛文化、中原文化的光辉和活力。许多王朝纷纷在此建都,使河洛中原地区长期保持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和巨大影响力,洛阳、开封作为古都的繁荣景象,可见一斑。不同时期文化发展所表现出的差异性一面,正说明中原文化发展经历了不断更新的过程,既把本身文化传播、渗透出去,又吸纳、凝聚周围文化,从而使得中原文化能够长期保持其领先地位。北宋灭亡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重心

的转移,中原文化的繁荣程度和影响力随之减衰。但河洛文化、中原文化传统的主流和内核,也为以后各代所传承。

可见,从远古到北宋,河洛文化作为根文化、主流文化的发展,构成了一个连绵不断的序列,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河洛文化强大的生命力、辐射力、同化力,以及它的根源性、厚重性、融合性等,充分反映了中华文化的精宏与博大,是华夏民族用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和思想源泉。大量文献、考古材料,以及后世主体文化的发展趋向和表现特征,也足以向世人证明,河洛文化对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形成和中华文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同时另一方面,人类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河洛文化向外方区域的传播与发展,与人口的流离迁徙密切相关。从大范围来说,历史上自中原地区南下的移民数量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其文化上的传承和影响也最为突出,其中又以族群性的移民表现特征最为明显。

因此,河洛文化作为“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原外流人口群体中也具有根深蒂固的意识和极强的传承性,并使得河洛文化传统在移民聚居地区产生了久远深刻的影响。因此,河洛文化的广泛传播,与历史移民问题密切相关,而中原以外各区域文化的发展及特征,又与历史移民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南方闽、粤、台等地,常称历史上自北方或大陆地区迁徙过去的移民为“河洛人”或“河洛郎”,正是因为他们的祖籍地在中原,他们的先辈最初是从中原区域辗转南迁的。由于“河洛”曾长期是中原河南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祖居地的标志性区域,是精神文化层次的象征,所以这些移民,甚至包括不少先祖来自北方其他地区的移民,都世代代具有如此深刻而不可改变的“河洛”印记,这足以说明河洛地区的巨大影响力,说到底乃是河洛文化的影响力。当然,由于历史久远,这些南移民先祖的成分非常复杂,能辗转迁徙到闽粤沿海及台岛地区定居生活下来的,已经历了无数代、漫长时期的繁衍和播迁。

关于中原外迁移民族群其文化传统的传播和影响问题,客家族群的南迁、定居和发展,无疑表现出十分鲜明的特征,对认识河洛根文化的作用问题具有其典型的意义。

客家文化,是在客家族群中一直保持下来并富有个性的文化传统。它既表现出早期河洛文化的内涵,又具有魏晋唐宋时期的中原世风。若从整个中国传

统文化的发展过程去认识,客家文化既表现出唐宋以前不同历史阶段中原文化的兼容性,又表现出北宋灭亡以前早期中原文化的原始性。

所谓“客家”,本是指客居他乡的家族,即相对于土著居民而言,这些家族是从外地迁徙而来。王力《汉语音韵学》“客家话”引文说:“‘客家’是‘客’或‘外人’的意思,因此,客家就是外来的人;他们的语言、风俗、谱系,都足以证明。”“客家”最初不是自称,而是他称,是土著民对这一特殊族群的称法。“客家”或“客人”作为这一特殊族群的名称,大约在宋、元交替之际确定下来,从而形成一个独特的汉族民系。“客家”英文作“HAKKA”,是从客家人对“客家”二字的读音而来。故此,有人认为此读音源自“河洛”二字古音的音变,“客家人”即“河洛人”。还有人据此认为,客家称呼是由于客家人对自己祖先“夏家人”的崇拜观念而产生。

客家族群,是历史上自河洛、中原地区南迁聚居的移民及其后裔所组成的群体。历史上由于战乱等原因,自中原地区南下的移民可谓不计其数,在南方地区,后世有大量居民或族群都是中原南迁移民的后裔,但显然不是所有南迁中原之民到南方定居后都成为客家人。客家族群是在一定时期内、特殊环境下形成的。在所有移民群体中,客家人也最具特色和文化个性。

客家先民的主体,基本上是在西晋永嘉之乱以后成批南迁的,但也基本上不是在一定时期内一次性迁徙到南方定居。中原先民南迁聚居并最终形成客家民系,经历了长期频繁的迁徙过程,也经历了无数磨难和开拓家园的艰辛。空旷贫瘠、人烟稀少的山区,成为这些逃难移民被迫选择的乐土。同时,当某一地区的移民数量急剧增多,或受战乱等因素的影响,这些移民又会再度转移。早期客家先民迁徙的主流,大致是首先集聚于长江以北的豫皖鄂交界地带,而后渡江,顺赣南、闽西、粤东的山岭地区迁徙,或分流到周边地区。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宋室南渡等,都是引起大范围迁徙的大事变。基于此,客家研究先行者罗香林曾提出五波迁移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韩廷敦(Ellsworth Huntington)、英国传教士肯贝尔(George Campbell)等则提出三波迁移说等。

长时期地流转迁徙,使得客家人的分布区域十分广泛。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一书中,依据调研资料认为,国内客家人主要聚居在粤、闽、赣、桂、川、台等地,并粗略统计出纯客住县有33个,非纯客住县144个。这里只是相对而言

的大致划分,是后代经过无数次流离播迁之后所形成的基本分布格局。明清及近现代,大量客家人又迁居海外,遍布世界五大洲的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所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有华侨的地方就有客家人”。早期客家先民迁徙的情况尽管十分复杂,但人们对客家先民根系中原、源自河洛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这也是客家人的共识,客家民谣中说“要问客家哪里来,客家来自黄河边”。

客家族群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民系,正是因为这一族群南下后一直到今天,虽经历千年沧桑,却仍能始终顽强保持其移民群体的传统和文化个性,而不被其他族群所同化。这种传统和个性,正折射出其中原南迁先民的传统和个性,包括品德、理念、语言、风俗及精神文化等方面。而客家先民的传统和个性,则体现了河洛文化或大范围中原文化的传统与特色。黄遵宪《人境庐诗草》中说:“中原有旧族,迁徙名客家”,“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说明客家与河洛、中原在血缘、地缘上有着根系的连接,客家文化与河洛文化有着根文化的渊源。

中原是中华众多姓氏家族的祖根地,客家家族也是如此,但仅从这方面不能说明客家的文化个性问题,因为大量根于中原的移民家族及其后裔并不是客家人。河洛根文化之所以能在客家民系中得到充分体现并世代传承,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至关重要的因素:

第一,中原家族人户自发性成批南迁,流向相对一致,聚居区大致类同。

第二,长期相对闭塞的群居生活环境。早先人口密集、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对后来成批迁移的外来之客而言,显然难以安居和发展。如长江中下游两岸,以及江浙等其他历史上比较富庶的地区,有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但却很少有客家村落。即使在移民辗转迁徙的过程中,有一部分可能会融入到这些地区的移民,也会被同化而逐渐失去其原本的个性。因而,客家南迁定居的地区,基本上都是相对封闭、落后、人烟稀少的山岭地带,如最先集中聚居于赣南、闽西、粤东等地,所谓“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长期封闭聚居的生活环境,使得他们的语言、习俗等能够世代传承下来,或者说其主体成分一直保持着固有的传统。如颇具特色的客家方言,其常用词语被认为是古代所谓的“雅言”,体现出中原古音或古代以中原方言为基础的官方语言特色。

第三,保持其浓重的先民本色。从河洛文明的起源,到夏商周统治的中心区域,再到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及北宋时代,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一直是文

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并具有很强的继承性和连续性,甚至这一区域文化成为官文化的代表,而带动和影响着其他的地域文化。而晋末丧乱之后大批南下的中原移民,正是秉承着这样的文化特质,他们原本又多是中原的贵胄之家、衣冠之族。因此,这些移民及其后裔,无论迁居何地,都十分注重继承先祖传统,维护祖上盛名,保持先辈本色,对先民的传统有很强的固守观念和维护意识。如崇祖、重家、立祠、祭祖、修谱等,凡客家地区都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在观念意识上他们也都以中原汉文化的传承者而自居,这正是客家人历经千余年、播及海内外而仍具鲜明个性的重要原因。如语言是人文特征最重要标志之一,客家人即把自己的母语称为“祖公话”,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肯舍弃,充分体现这一族群浓重的先祖文化情结。

第四,重教的文化传统。崇文重教是客家人突出的文化传统之一,这些家族为保持“衣冠”之裔的本色,无愧于先祖,无论在什么艰苦条件下,都要把教育后代知书习礼放在最为优先的地位,同时还要力耕而维持生计,所谓“耕读为本”。由于男子多出外闯天下,妇女便担当起治家育后的重任。这是客家地区十分普遍而恪守不变的族群理念。因此,在各个时代,客家族群中都涌现出许多彪炳史册的人物,这也是客家人之所以能够世代继承、发展先民文化传统的重要支撑。

虽然我们不否认客家特性中不同程度地汲取了迁居地文化的因素,但从整体特征来认识,客家族群的形成,的确与中原移民自发性成批南迁有着直接的关系。客家文化的个性,的确与河洛文化、中原文化有着很强的渊源联系。客家人根于中原,客家文化源自河洛。客家民系、客家文化在中国、在海外各地的广泛影响,折射出河洛文化、民族根文化源远流长的生机和活力。

编者

2010年6月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河洛文化的产生、形成及发展	1
第一节 滥觞期的河洛文化	1
一、河洛文化的考古探寻	2
二、河洛地区文化与周邻文化的关系	13
第二节 形成期的河洛文化	22
一、夏商周时期河洛地区的政治中心地位	22
二、河洛中原地区民族融合的初步发展	27
三、河洛区域文化的发展轨迹及相互交流	32
四、河洛文化的初步形成	34
第三节 丕兴期的河洛文化	38
一、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河洛地区的社会政治环境	38
二、河洛中原地区的人口迁移与民族融合	43
三、河洛文化的传播	52
四、河洛文化的前代继承与发展	55
第四节 鼎盛期的河洛文化	61
一、隋唐宋时期的中原政治形势	61
二、中原社会经济的曲折发展与繁荣	72
三、河洛地区的社会文化风貌	79

第二章 历史上的中原南下移民与客家先民	97
第一节 早期中原地区的南下移民问题	97
第二节 客家先期移民的南迁	103
一、关于“客家”的界说	103
二、客家先民的南迁	104
第三节 客家先期移民对河洛文化传播的作用	108
一、河洛文化的时段性和传承问题	108
二、客家先期移民对河洛文化的传播	121
第四节 客家民系的播迁与文化遗产	133
第三章 客家文化与河洛文化的渊源关系	149
第一节 关于客家文化的认同	149
第二节 客家文化传统的渊源透视	152
一、南迁先民的根文化传统	152
二、客家文化传统的历史追溯	161
第三节 客家家族的河洛之源	168
一、关于家族起源问题的基本认识	168
二、陈、胡两姓家族问题	174
三、温氏家族与江西石城温氏	178
第四章 不同客家区域的根文化传统及其世界影响	183
第一节 赣南中心区域的移民文化特征	183
第二节 闽粤中心区域的移民文化分析	192
一、“闽粤通衢”的历史见证	192
二、闽西客家区域的河洛文化传统	198
三、宁化小范围的地位与作用问题	208
第三节 近代客家信仰意识的发展及演变	230
一、主体客家先民的原本信仰意识	231
二、聚居地客家传统信仰的发展	234

三、近代社会环境下客家人的思想革新	237
第四节 客家族群文化传统的世界影响	243
一、美国客籍移民的集中区域及文化传统	244
二、早期夏威夷客籍移民的文化传统	248
后记	259

第一章 河洛文化的产生、形成及发展

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地带。产生于这里的河洛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源头,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河洛文化起源于史前,形成于夏商周,发展于秦汉魏晋南北朝,鼎盛于隋唐北宋。先进的河洛文化,主要通过人口迁移、民族融合等形式,逐渐传播到全国各地。同时,周边地区及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影响着河洛中心区中原文化的发展。河洛文化在与周边文化的相互交流中,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学习,共同奠定了先进的中华文明的基础。

第一节 滥觞期的河洛文化

河洛地区位居中原腹地,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最早并具有核心作用的一个文明发祥地。在远古时期,这里是传说中黄帝和炎帝所代表的部落集团活动的核心地带,在以后的发展中,又以这两个集团为基础,与周围各部族集团通过长期的战争、交流、融合,最终在河洛地区的伊、洛、汝、灃、涧流域形成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融合中心。考古学的研究表明,早在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在河洛地区生存、繁衍。到了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是其发展中的链条,环环相扣,自成序列。并在长期的发展中,由于其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熔炉,进而诞生了中国早期的文明。

一、河洛文化的考古探寻

(一) 河洛地区的旧石器文化

早在旧石器时代,河洛地区已有人类居住与生产,他们是河洛文化最早的创造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在河洛地区发现了许多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址或地点。在卢氏县发现了“很可能是晚更新世后期的智人化石”^①,其中包括4块人类头骨碎片及2枚牙齿化石。在三门峡会兴镇会兴沟及水沟,发现了砍斫器、大尖状器、石球、砾石石核及石片等旧石器,其时代与北京周口店第1地点下层相当,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四五十万年前。在陕县张家湾与赵家湾,灵宝营里、孟村、邢家庄,渑池县黄河南岸的任村、青山村、南村等地均发现有旧石器地点,其中在灵宝营里,采集和清理的石制品共82件,类型包括石核、石片以及修理石器的石锤、石砧和石器等,其时代属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②在洛阳市凯旋路,发现了诺氏古菱象化石及大量石器。其中的象化石,发现有完整的门牙,长2.1米,另有下颌骨、脊椎骨、肋骨和白齿。与象牙同出的石器近40件,其中石核13件、石片18件,还有圆刮器、长刮器及尖状器、砍砸器等,制作方法是锤击法,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万年左右。^③在龙门南魏湾、郭寨,发现有纳玛象的头颅骨、白齿化石和一部分石核、石片、刮削器等,遗存的年代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在伊川穆店,考古工作者发现两件旧石器,分别为石核和刮削器,从伴存的犀牛化石看,石器的时代属旧石器时代早期。在巩义洪沟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存,发现于晚更新世形成的细砂质马兰黄土中,其中有石片和尖状器、石核和砍砸器等,动物化石有纳玛象、赤鹿、羚羊等。位于洛阳市郊的北窑旧石器遗址,出土石器近800件,并发现少量化石及人类用火遗迹,石制品主要由石砾石制成,主要是初级产品,即石核、石片,其中以石片最多,打制方法主要采用锤击法和砸击法。根据打制石器在遗址剖面中连续分布的情况,说明

① 季楠、牛树森:《河南省卢氏县发现人类化石》,《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4期。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灵宝县文管会:《河南灵宝营里旧石器地点调查简报》,《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

③ 张森水等:《洛阳首次发现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82年第2期。

在距今 10 万 ~ 3 万年前,这里是古人类活动的场所。^①

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许昌人”的发现。2005 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曾被誉爲许昌十景之一“灵泉瑞溢”的灵井镇西侧,发现了距今 10 万 ~ 8 万年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出土了许多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包含大量古人类行为信息。尤其是灵井遗址头盖骨化石出土层位的时代,是世界古人类学研究史上的最敏感时段。目前在非洲以外的其他大陆,距今 10 万年左右的人类化石非常稀少。西方学术界一个较为盛行的观点认为,现代中国人及其中国的晚期智人,如柳江人和山顶洞人等,都是来自非洲的人类后代,中国的北京猿人等在距今约 20 万年前即已消失。我国古人类学家吴新智院士曾提出现代中国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学说,但由于发现相关阶段关键的古人类化石(如头骨)较少,成为该学说的一大缺憾。“许昌人”的发现,则为我们探寻现代人演化的链条提供了关键材料。灵井遗址出土的大量精美骨器,总数占国内已出土旧石器时代骨器的 50% 以上,这说明除打制石器之外,骨器同样是原始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用具。在灵井遗址,还发现了一批处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阶段的典型细石器。这批精美的细石器,有细石核、细石叶、端刮器、尖状器和修背器等,它们是细石器文化区域的最南代表。在旧石器时代末期,灵井人过着游牧生活,灵井遗址则成为猎人们在泉水附近生活的一个缩影,是他们工作营地的一部分。

截至目前,在河南境内发现的旧石器地点已有 60 余处,分布在豫东之外的全省各个地区,其中以豫西、豫西南地区最为集中。此外,还发现有南召小空山、荥阳织机洞、安阳小南海三处洞穴遗址。位于河南荥阳市城南 20 公里的织机洞洞穴遗址^②,地处嵩山北侧的低山丘陵区边缘,海拔 300 ~ 800 米。这里丘陵绵延,沟壑纵横,水源充沛,植被丰富,由石灰岩构成的低山,岩溶作用强烈,随处可见裂隙和溶洞,因此也成为中原远古人类理想的居住地。尤其是织机洞遗址,海拔高程 452 米,原洞进深 40 米,现进深 22 米,洞前有一条季节性河床,高出洞口 30 米,洞下为一片宽阔的半月形河谷台地,高出地面 6 米。远古人类充分利用周围的水土资源,从而获得生存的保障。例如水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物质基

① 马春梅、余杰:《试述河洛地区旧石器考古的文化内涵》,《河洛文化论丛》第 3 辑,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② 张松林、刘彦锋:《织机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2003 年第 1 期。

础,因此原始居民选择的山洞附近都有长年不断的水流、湖泊或泉水,以保证他们的生存需要。当然同时也要避开河水泛滥或倒灌入洞,淹没居住地。洞下开阔的河谷台地,为人们提供了适宜的活动场地。另外,山洞周围植物茂盛,有较丰富的果实、枝叶供人们采集食用,附近有许多动物可供狩猎等。

经考古发掘,织机洞地层堆积之厚,文化遗迹、遗物之丰富,仅次于中国猿人遗址,因此被称为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第二洞。^① 遗址最厚处地层达24米以上,其中的旧石器文化层最晚的时间可能在距今7万年前,遗址堆积的肇始时代,暂时保守估计在旧石器中期的前段,也不排除早到旧石器早期的某一阶段。遗址内出土的动物化石,有上万件之多。既有哺乳类如中国鬣狗、肿骨大角鹿、丁氏鼯鼠、原始牛、斑鹿等,又有鸟类化石。在文化遗迹中,用火的遗迹是最引人注目的。在近100平方米的发掘区内,虽然仅有20平方米清理至24米的深度,但却密集分布17处用火的遗迹。这些用火遗迹多呈圆形或不规则形,遗迹层面上有灰烬堆积,灰烬下有烧烤痕迹,其周围及地面被烤成褐色或红褐色。火的使用,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人类使用火的意义重大,它为人类自身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广阔的前景,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火的使用,是人类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迈向文明的第一步,是人类从动物界最终分化出来的标志之一。

织机洞出土的文化遗物,主要为石制品。其中有用于制作石器、加工生活资料的石器,同时还发现有打击形成的骨制品。从石制品来看,织机洞遗址反映出中国猿人石器文化期后工业所共有的特点,即砸击技术趋向衰落,锤击技术占主导地位。而且同时具备石器时代中国北方主工业的特点,即石制品中多台面石核多于单台面石核,单刃石器多于多刃石器。“从时代上考虑,它是已知(洞穴类型)北方主工业分布最南、时代较早、石制品最丰富的一个组合。”^②

在生产力极为低下、“人民少而禽兽众”的恶劣环境下,洞穴成为古代人类理想的栖息之地。那些奇异深幽的天然洞穴,成为人类最适宜居住的“家”。在洞穴岁月里,他们以近亲血缘聚集在一起,过着群居、群婚的生活,依靠集体的力

^① 张森水、张松林主编:《河南旧石器考古与第四纪研究论文集·前言》,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② 张松林、刘彦锋:《织机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2003年第1期。

量和智慧,战胜猛兽和恶劣的环境,生存和繁衍后代。在逐渐获得生存本领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的旧石器文化,促进了旧石器工业的一次次进步,并最终在距今1万年前后,进入新石器时代。

(二)河洛地区的裴李岗文化

大约距今9000年前,河洛地区进入了以炎帝神农氏为代表的原始农耕社会。在炎帝时代,以炎帝为首的汉族先民,已经创造发明了耒、耜等农业生产工具,已经走出洞穴,走向一个定居农业的新时代。如“作耒耜,教天下种谷”,是农业生产的真实写照;“立历日”、“作蜡祭”,说明早期先民已有了依据农业生产规律而确定的历法、年节;“建明堂”是为祭祀活动而建,为我们研究炎帝时代先民的定居形式和房屋建筑提供了线索;“制针灸,作巫方”,尤其是广为流传的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表明了汉族先民在炎帝时,通过生产和生活实践,逐步懂得并掌握了医药和治疗;“作下谋之乐”、“作五弦琴”,是说已经发明并制作了乐器;“日中为市”更说明当时有了定居生活,有了稳定的农业生产,并随着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以及生产生活需要,产生了物品交流所需的市场。市场的产生和发展,又必将推动和促进汉族先民农耕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传播。而《淮南子》所描述的“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则向我们展现出一个炎帝神农氏时代人们利用大自然的优厚赐予,利用拙朴的耒耜,开启了华夏农耕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推动了古代华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正因为此,炎帝部落成为炎帝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始作耒耜”的神农炎帝,则成为开创我国农耕文化的始祖。

炎帝族的发祥地在今陕西境内的渭水上游一带,后逐渐向东向南迁徙至今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北、湖南等地,与其他氏族、部落杂处和交融,为后来华夏族与汉族的出现奠定了初步基础。炎帝神农氏部落沿黄河向东传播至河洛地区,并到达豫东地区,在陈地(今河南淮阳)建都,建立了农耕文化的中心。

与炎帝神农氏原始农耕文化相对应,在河洛地区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考古发现的距今9000~7000年的裴李岗文化,再现了中国农耕文化之初的经济形态和社会面貌。

裴李岗文化,因1977年首先在河南新郑裴李岗发现而得名。目前发现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共150余处,几乎分布全省各地,重点分布在豫西山地和东部边缘